

容庚：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本报记者黄浩苑、邓瑞璇

他被王国维赞誉为“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之一。

他年轻时编著的一本字典，至今仍是很古文字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之书。

他28岁才北上求学，以中学生的身份叩开北京大学校门，一跃成为北大研究生。

国家动荡之时，他费尽心力收藏国宝，又在国家需要时将毕生所藏悉数捐给国家和人民。

容庚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些陌生。然而在古文字尤其是金文领域，他是一位绕不过去的学术大家。

容庚（1894—1983年），原名肇庚，字希白，初号容斋，后改颂斋，东莞莞城人。毕生致力于学术，尤精于金石之学，书画、碑帖均有涉猎，编撰专著30余种，成就卓著，嘉惠学林。

南粤小邑东莞为何能够孕育造就容庚？年少容庚治学为何始于金石？容庚何以从中学生成为北京大学研究生，再成长为学术大家？又如何将毕生投入治学与为国收藏？

寻常：也曾贪玩

金文，是什么样的文字？

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就叫金文。之所以叫“金文”而不是“青铜器文”，是因为周朝时把铜叫金，铜器上的铭文就叫“金文”或“吉金文字”。正在东莞展出的容庚的作品和收藏中，有很多这样的文字，让观众兴致盎然。

容庚曾说，所谓古文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用过而今天还不认得的字。容庚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偏门”的文字呢？

在容庚的年代，东莞只是一个小县城，但其实，它有着绵长的文脉。

东莞展览馆展品部主任杨叶帆和她的伙伴们做了大量关于容庚的研究。她介绍，唐宋以来，随着氏族南迁及经济发展，东莞讲学育才之风渐浓。特别是明清两代，政府兴学，官员促学，乡绅助学，宗族重学，公私学馆众多且体系完备。“仅在容庚出生地莞城，不足1.5平方公里内就设有传统学馆18所。”

容庚出生在东莞的两大名门望族，祖父容鹤龄是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并且殿试三甲第八名，而外祖父邓蓉镜是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容庚的成长离不开四舅邓雅，他曾说没有邓雅就没有容庚。

邓雅青年时留学日本，学美术、诗、书、画、印兼通，尤善治印。刻印在南方卓有声誉，名震一时。邓家治印到邓雅已经传了11代，邓雅曾说，“我家篆刻寻常事，不断相传有印人。”

容庚少时就跟着邓雅学治印，治印需习字，邓雅认为不认识这些字，何谈治印？于是容庚就由印及字，对金石古文字的兴趣大增。许慎的《说文解字》、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都是容庚时常翻阅的书籍。

容庚的弟弟容肇祖回忆他们少时随邓雅学习的经历时写道：“从刻印的兴趣，他（邓雅）逐步深入地把我们的学习中心纳入正常轨道，使我们青年好奇心自觉地转到必读文史古籍等方面去。”

《说文古籀补》是容庚首选的参考书，这是当时最全的一本金文工具书，但也恰恰是因为这本书，让容庚产生了补辑之志。“因为容庚觉得这本字典还不够全，他要编一本更新更全的出来。”杨叶帆说。

容庚自1917年中学毕业后，一边在东莞中学教书帮补家用，一边编写《金文编》，历时6年完成了4册《金文编》初稿。《金文编》里收集了很多商周到秦汉时期的文字，而且开创性地收录了图画文字。一直到现在，《金文编》仍然是很多古文字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之书。

容庚一个中学生，就能编出如此旷世巨作，让人不禁好奇，他是不是天纵之才？其实，他也只是一个寻常人。容庚少时也曾沾染恶习，他曾说，“嗜赌博、吸鸦片、好饮酒……母亲邓琼宴十分痛心，除了耐心劝解之外，邓琼宴还效仿孟母，随着邓雅辗转广州与东莞两地陪读，希望容庚能够多受舅舅教诲，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母亲去世后，容庚在《颂斋吉金图录》序中写道：“慈母见背，欲养不待，所以报母者，惟当自奋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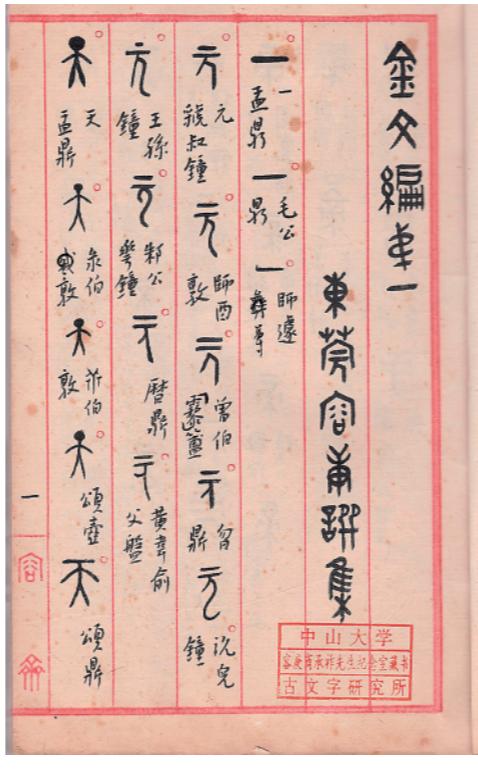
跳级：从中学生跻身研究生

在东莞中学任教的时候，容庚就萌生了升学深造的念头。1922年，容庚与三弟容肇祖一起北上，经过天津之时，拿着邓雅友人写的介绍信去拜见了罗振玉。当时罗振玉已经名满天下，是甲骨文研究方面赫赫有名的学者。

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生所写，但《金文编》



晚年容庚。（东莞市文广旅体局策展组供图）



《金文编》初稿手稿。

他说周代。后来容庚对人说，他并非好辩，只是想从辩论中学到别人鉴别铜器的知识。

容庚如鱼得水，一头扎进故宫浩瀚的文物海洋中，研究领域也开始从古文字拓展到古器物。其弟容肇祖在撰写的回忆文章《容庚传》中说，“故宫的珍贵古器和古器物资料，琳琅满目，像海洋一样蕴藏丰富，开阔了容庚的古器物研究的视野。这些古器物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他的研究热情。”

此后，容庚更是钻进青铜古器的研究中，一发不可收。在鉴别了众多真伪杂糅的青铜器后，他先后编著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等多部著作，对青铜器进行不懈的研究和考证。之后，更是以8年的时间专门研究商周青铜器，系统而全面地编著了《商周彝器通考》。

这一集大成之作，让青铜器的研究由旧时金石学迈向了近代考古学的范畴，被学界评为“具有青铜研究历史上里程碑意义”。这本书也成为青铜器研究者的必备书籍。

“清官鉴宝”对容庚的另一个影响，是开启了他收藏青铜器的人生。

受聘燕京大学后，月薪涨了不少，再加上写文章和印书所得，容庚手头宽裕许多。北京的琉璃厂不时便会出现容庚的身影。虽不比一掷千金的大收藏家，但他购藏的器物中，也不乏宋徽宗、赵佶、王羲之等精品。

容庚购藏青铜器最初的出发点，是为研究古文字、铜器提供实物材料。随着收藏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趣事也越来越多，容庚更是乐在其中。有一个汉代青铜杯“破镜重圆”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1931年，容庚在古玩摊上发现汉代青铜残杯半只，上有铭文“丞不败利”四个字。容庚不解其意，但因残杯造型别致、纹饰精美而买下。数月后他再逛琉璃厂，又发现了另外半只残杯，铭有“厚世”二字。两个合起来便是完整的铭文：“丞不败，利厚（后）世”。时机的巧妙，铭文的吉祥寓意，都让人不禁感叹这是“天作之合”。

然而，他又话锋一转，说道：“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

容庚把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也传给了他的学生。他鼓励学生说，要学会古文字并不难，自己当初学金文时还是个中学生。容庚的学生、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说，容庚和商承祚两位前辈对他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容老一贯提倡‘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自强不息精神，是我的座右铭。”

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等前辈学者对容庚学术上予以了很多无私的提携，对容庚影响很大，也将这种关怀与帮助给予他的学生。有学生找不到资料，容庚找到了当晚就骑自行车到学生宿舍送上门。

在易新农、夏和顺合著的《容庚传》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容庚对最后一批学生，仍然坚持每周两次去学生宿舍与同学们谈心、谈学问。每来一次学生们就在墙上刻一杠，转眼“正”字已经成行。容庚的学生、岭南书法大家陈初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八六高龄乐育才，殷勤传语寄情怀。墙头正字应犹在，记得先生数度来。”

罗振玉研究离不开器物。1926年，容庚得到一个近距离研究古铜器的机会——他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研究故宫所藏的海量古器物。

当时的委员会里，容庚最为年轻。他虽对古铜器不太了解，但精通金文，可以通过文字来辨别古铜器的年代和真伪。在每周的鉴定会上，大家就器物的形制、名称、年代、真伪、铭文等问题各抒己见。容庚经常与其他专家认真争辩；别人说真，他说假的；别人说商代，

由字及器：抱残守缺，为国收藏

从1922年来到北京，到1946年南下任教，北京见证了容庚20多年间“由文字而及器物，由器物而及于史迹”的治学发展，也见证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

容庚研究离不开器物。1926年，容庚得到一个近距离研究古铜器的机会——他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研究故宫所藏的海量古器物。

当时的委员会里，容庚最为年轻。他虽对古铜器不太了解，但精通金文，可以通过文字来辨别古铜器的年代和真伪。在每周的鉴定会上，大家就器物的形制、名称、年代、真伪、铭文等问题各抒己见。容庚经常与其他专家认真争辩；别人说真，他说假的；别人说商代，

草地周刊 书话

潘建伟

从刘克敌1997年发表《略论陈寅恪的“白头”诗》起，到《陈寅恪和他的世界》一书的出版，已有24年。这期间他出版过《陈寅恪与中国文化》《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等三部著作，本书是第四部。根据作者的说法，与之前诸书不同的是，此书旨在将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普及于普通读者，有“引渡”之意，少“创新”之功。事实上，对于人文学术来说，创新有创新的价值，普及也有普及的意义。学术普及并非人人都能做，首要的前提就是从事普及工作的人在此领域已有精深的研究。比如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欣赏》、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等，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都已经成为经典范例，其价值并不亚于他们的纯学术研究。《陈寅恪和他的世界》也是如此，本书有选择性地详细解读了陈寅恪的著述，用流畅平易的语言将陈先生之思提到玄，所下之功夫很可能不下于作者的其他著作。并且，在陈寅恪研究界，此前似乎很少有人做过这样细致的工作，在写法上是一种创新。如此可以说，此书是一种有创新意义的普及了。

如果进一步考察作者所选释的篇目与所关注的重点，就更有意味。此书共分两编，第一编是“陈寅恪著作释读”，第二编是“陈寅恪之学术交往”，读者大多数对前一编更有兴趣，笔者也是如此。因为根据此书《后记》的说法，第二编是为了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些期待的变化，不至于过于沉闷”，而第一编篇幅占到三分之二，显然是作者用力之所在。第一编共收18篇释文，每篇释文后附有原文，意在通过释读引导读者向原作过渡。作者所选释的原文主要来自陈寅恪的三部论文集，即《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与《寒柳堂集》。每部选择5篇，共15篇，可见作者对于这三部著作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其余3篇中，2篇选自《元白诗笺证稿》，1篇选自《柳如是别传》，由于后两部著作均是成体系之巨构，用单篇文章的形式难以全面驾驭，不得已只好选取前者的第一章《长恨歌》、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包括附录《读〈莺莺传〉》）与后者的第一章《缘起》，借一斑以窥全豹。

一个好的选本，除了要确保内容疏解上没有硬伤、语言表达上流畅易懂外，往往还要能反映学者个人的思想观念或批评取向，故而选释并不仅仅是对原文的亦步亦趋，也是作者借此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途径，比如《宋诗精华录》代表的是陈衍对于宋诗的理解，而《宋诗选注》则反映的是钱锺书的宋诗观。从作者选释的文章中也可见出其关注的重点所在。像陈寅恪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炯集团》《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等诸政治史论文，本书一篇都没选。作者以往的相关著述也显示出他对纯粹的政治史研究并不感兴趣，或者即使涉及政治史，也必然会联系他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即文化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命运。本书所选释之诸文涉及佛教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汉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等，都可涵盖于“文化精神”这一总纲之下，而知识分子是“文化精神”的代表，他们的命运会影响某种文化是向上发展，还是堕落退化；知识分子的精神是英特近，还是萎靡困顿，很大程度上就能反映这种文化精神的健康状况。故而本书表面上是重在文献选释，将学术普及于大众；深层来看，其实与他之前的著作一以贯之，均反映了他的文化关怀。

在陈寅恪的研究中，“文化”是个关键性词汇，它与另一关键词“种族”，彼此交互参杂，错综演进，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事实证明，“文化”高于“种族”，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能延绵数千年，并不是由于“血统”的成功，而是在于“文统”的胜利。这层意思作者在书中多有表露。比如在解读《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后，他说：“李白究竟是胡人还是汉人抑或混血儿其实都不要，因为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一直都不仅仅是汉族的文化和文学，而是包容、包括和融合有许多少数民族甚至外来文化与文学的精华在内。”李白是汉人，还是胡人，的确没有关系。中国经过史上的多次大变局而能历久弥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文化具备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转化再生的能力。就像陈寅恪借助“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颂红妆》（《柳如是别传》）等来阐发其文化思想一样，作者通过研究陈寅恪也表达了自己的文化关怀，历史与现实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交相映发，在这样的对话中往来生息。

往年读夏承焘《天风阁词学日记》，在1941年7月22日有一则记载，我印象很深：

“孟辛来，劝其当有一种学问事业，念兹在兹，为安身立命之地，然后可到无闷无扰境地，不致以琐事动恼。佛家云：以一大事因缘出世。时时领此，则俗事皆是余事，不能浪费我一分毫精神。”

学者愿意立志于做“一种学问事业”，是值得庆幸之事。虽然作者也研究过章太炎、鲁迅、吴宓等陈寅恪的同时代人，但我想在他内心，始终是将陈寅恪研究当作是“安身立命之地”，念兹在兹，无问西东，颠沛造次，不改初衷。后人倘有提及作者，一定同时会想起陈寅恪，或者在阅读陈寅恪时，应该也会记得有一位作为“陈寅恪研究专家”的刘克敌，文化精神就是这样代代相续，绵延不息。